

专家论坛

百年“龙学”与中华文脉

□ 戚良德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最重要的“元典”，更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华国学经典，为集部“诗文评”之首。问世1500多年来，由于其重要的元典性和独特地位，在文史哲等不同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积累了巨大的文献资源。

20世纪初期，《文心雕龙》被黄侃、范文澜、刘永济等国学大师搬上大学讲坛；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对这本书的研究终于形成一门显学，被称为“龙学”。一百年来，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据统计，有关专著、专书已达750种，论文一万篇。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文化之幸，但对进一步的研究而言，却是一座横亘在面前的高山，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逾越的。这需要专业研究者集中一定力量对海量资料进行全面梳理，从而摸透家底，看清道路，轻装前行。

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检视，在中国文论和国学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价值。为此，需要着重于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文心雕龙》文本进行较为彻底的校勘和整理，最终拿出一个更为可靠的具有“定本”性质的文本，以解决迄今为止尚未有令人满意的《文心雕龙》文本的问题；二是汇聚古今往来的《文心雕龙》评论和阐释成果，尽可能做到集其大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从而使对《文心雕龙》义的理解和把握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力求开创“龙学”的新境界；三是对近百年来丰富的“龙学”成果进行全方位集中梳理，以充分展示其巨大成就，亦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从而为新世纪“龙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新的基石。

《文心雕龙》的元典性是形成“龙学”的根本，百年“龙学”的发展和兴盛则使其走向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前沿，因此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作出独特贡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龙学”之于学科建设的意义，不仅是研究一部《文心雕龙》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文论、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哲学、中国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百年“龙学”是中国文论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对这个典型的全面解剖，无疑将提供多方面的经验，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成果选介

滇铜贸易与清代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 麦思杰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与民族学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从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纵向关系去理解这一过程，忽略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改土归流的影响。事实上，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土司地区的政治格局，推动了当地社会的货币化进程，为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广西右江地区的土司，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司。在右江土司之中，又以田州岑氏土司实力最强。在有明一代，岑氏土司既是王朝政府依赖的重要军事力量，又是“叛乱无常”的政治势力。明政府曾多次尝试对当地进行改土归流，但均以失败告终。嘉靖初年，岑氏属下的王受、卢苏“叛乱”，反对改流归土，王阳明亦只能以“裂土重建”、改流归土的措施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入清以后，清政府却能较顺利地在当地逐步建立统治秩序，并在光绪年间开始展开改土归流。这一结果，实际上与清代右江地区滇铜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

清初，因全球白银贸易的发展与国际贸易下跌，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银铜比价发生剧烈波动。康熙年间，白银价格持续下跌，铜钱的价格不断上涨。根据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的估算，清初白银一两所换得制钱的数目大约从七八百到八九百文不等，低于清政府规定1:1000的兑换比率。铜钱价格的上升，对广东沿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到云南贩运黄铜，变成了一项利润可观的商业活动。在此背景下，大量粤东商人沿西江西进，经右江抵达云南。右江亦成为重要的商道。滇铜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右江地区的市场体系。粤

东商人在右江地区的百色开设市场，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当地创建粤东会馆。百色粤东会馆是粤东商人控制右江贸易(主要是滇铜贸易)的商业组织。

百色在兴起之前为田州岑氏土司的辖地，位于田州城上游四十公里。但在岑氏土司的范围内，百色位处边缘地区，属岑氏土司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因此，滇铜贸易导致了右江地区市场体系的重组：一方面，滇铜贸易将右江地区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使这一地区开始受到全球化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在土司的版图之内出现了一个并非由土司管辖的区域性市镇。

粤东商人的进入与滇铜贸易的繁荣，为清政府向右江地区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粤东商人作为王朝政府的编户齐民，使得清政府的势力可以顺理成章跟随商人的力量进入当地社会。雍正初年，清政府开始在百色设官及军队。雍正七年(1729)四月，王朝政府将广西思恩府同知移驻田州百色地方。同年十一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又将右营游击驻扎百色。百色由此成为了右江地区第一个由王朝政府直接控制的政治军事据点。在明代，朝廷一直未能在当地安插官员，右江地区州府的一些官员均住在邻近府城，实为形同虚设。从雍正七年开始，王朝政府以百色为据点，不断扩大直接统治的范围。不过地说，百色是清末王朝政府能在右江顺利推行改土归流的政治基础。

粤东商人与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协作的关系：一方面，商人需要清政府为其提供政治庇护；另一方面，政府则借粤东商人的贸易扩展将政治力量渗透到了土司的辖地之内。

对“龙学”性质的探索及其应用领域的拓展



近百年“龙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成就，但“龙学”主要属于文艺学，其应用范围和领域相对狭窄单一，有些本应发挥的重要作用一直被轻视或忽视。对百年“龙学”的清理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反思机会，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龙学”的性质不仅是文艺学，也对我们今

天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百年来，《文心雕龙》虽然在大学讲台上展示了自己的魅力，但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一门选修课，课时量很少。之所以如此，应该说与我们对“龙学”性质的认识有关，也与我们缺乏对“龙学”的大规模清理和

全面研究有关。实际上，《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而且与当今大学教育密切相关，如思想教育、审美修养、写作训练等方面，《文心雕龙》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我们的认识却非常不够。再如社会服务方面，很少有人考虑《文心雕龙》这部中

国文化的元典之作可以服务社会实践。实际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是需要《文心雕龙》的，比如要考公务员，就要考“申论”，主要是写文章；各种场合的发言、报告，都是文章；企业也要制定各种文件，这都是刘勰所讲的“文章”的功夫，也可从《文心雕龙》中大受裨益。



奠定中国文论话语研究的强大基石

近年来，中国文论话语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文论话语中的地位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包括一些海外汉学家。牢牢抓住《文心雕龙》这把“金钥匙”，适时梳理“龙学”的丰富成果，可谓是抓住了中国文论话语研究的“牛鼻子”。

以《文心雕龙》为典型和代表的中国文论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华文化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有着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并涉及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传入以及文学观念的转变，中国文论对中华文化的有

效性、适应性被严重忽视或忽略，中国文论的完整性和独特性遭受削足适履的伤害。尽管我们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对此，我们深以为然，尽管这个检查和阐释要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而回归自我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认真面对并最终踏上中国文论话语的回归和还原之路。

季羨林先生早就指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对此，我们深以为然，尽管这个检查和阐释要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而回归自我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认真面对并最终踏上中国文论话语的回归和还原之路。

因此，超越从西方引进的所谓“文学”观念，回归中国文论的语境，还原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从而原原本本地阐释《文心雕龙》及其与中国文章、文学以至文化的关系，发掘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放眼全球文化和文学，找到中国文论自己的位置，乃是《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研究的归宿。我们梳理《文心雕龙》研究史，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就是要重新审视和把握《文心雕龙》这部旷世文论宝典，特别是其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之建构的根本意义。



中华文化魅力的生动呈现

《文心雕龙》全书只有三万七千余字，对这部书的研究何以形成一门著名的学问——“龙学”？其思想、文化价值到底是什么？一本书的研究形成一门学问且大师云集，从刘师培、黄

侃、刘咸忻、钱基博，到范文澜、陆侃如、杨明照、王利器、周振甫、詹锓等等，可以说蔚为壮观，这与其元典性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我们理应把这门学问的丰富成果予

以认真总结和梳理，从而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相信它不仅会吸引世界文论学坛的目光，在世界文论的舞台上天熠生辉，而且会引起人文学科众多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将其

运用到思想文化建设中，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教授)

研究心得

神话、传说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勃兴是20世纪世界上一大文化景观。民族的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根柢，中国新文学重述民族神话、传说即是从上古源头找到与现代文明、世界潮流相融相契的心灵原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分而言之，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具有以下源头活水之精神依归。

强大的人格意志力量。中国上古神话在讲述人与世界之间关系时，其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世界最终是如何征服的。相关英雄的流芳百世，并非基于他们的丰功伟绩。这些神话之所以被代代口耳相传，主要是因为它们彰显了人格意志力量的强大，人们深为膜拜。神话学者袁珂曾将“夸父”等一干群体称为中国的“巨人”族，“愚公”等亦在列。“夸父”是虽“败”犹荣，“愚公”的“成功”是他的行为意向感动了“天帝”。“大禹”可能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以其生命不竭“填海”不止，“杜鹃”则哪怕“泣血”也要把行人召回故乡。原始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说法应是取自这些精神母体。中国新文学的“新民”与“立人”思想充分表达了对神话英雄人格的向往。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中的“女神”们胆敢再造人间生天，因为她们抱定了“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的雄心。鲁迅的《铸剑》不啻“复仇”成功与否，而着意于“眉间尺”如何蹈厉性情和视死如归。汪静之的《精卫公主》修改版最终突出精卫的魂魄是“不填平东海誓不替卫”的坚定意向感动了“天帝”。

24对女孩儿全成饿殍。但她们的生命不死，变成24对人参，依然长留世间，再成“欢乐颂”。这是艰难时世中，广大人民对母国和文脉有着坚定信念的体现，是中国新文学“大地意识”的彰显。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抒写了大破后大立之激情，践行了文学上常见的“再生”母题。此中的“再生”不是基督的“复活”，而是生命形态的存活。这样的“再生”还有一种表现形态——“生死互通”：在闻一多、朱湘、彭燕郊等人的诗歌中，主人公在时代的“寻根文学”中，唱起了新时期的船夫，杨炼的《诺日朗》等等也是歌颂力量和奋进姿态。这些都是对强大人格意志力量的深情呼唤。

单纯干净的人性向度。“嫦娥奔月”中的“嫦娥”不忠于爱情，背着丈夫独自偷吃灵药，其结局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在古人看来，爱情不是向对方的一味索求，而是彼此互相付出。爱情是人性自私与否的测试剂。鲁迅的《奔月》虽另有深意，但也对“嫦娥”的贪婪和欺骗深表不

满。冯至的长篇叙事诗《蚕马》取材于干宝的《搜神记》，讲的是小姑娘娘思父心切之下信口开河，以托付终身给马匹交换其搭载自己见到父亲，事成又反悔，甚至将马杀掉以达封口，结果引火烧身，蜕变成一头蚕虫。爱情不能轻信，轻信者往往往靠信，靠信者必遭“报应”。现代作家高长虹、戴克家、吴祖光等或改写或重述“人”“神”之恋时，都强调了情感的非功利性，他们动人肺腑的爱情确实注解了“只羡鸳鸯不羡仙”。爱情如此，人生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单纯干净的人性在白鹿原中的关中大夫儒“朱先生”就是“白鹿精魂”，《古船》中与神灵对话，表达对单纯干净的人性之向往，在中国文学长卷中，庄子与屈原首开其中两章，而后世多有萧规曹随者。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从一开始，人在神话中就寄寓了生命不死的冀求。盘古死后，他的一毛一脉都衍变成了树木河流；女娲的肉身最终成为“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夸父渴死后，其手杖化为人参；瑶姬未嫁已死，其精魂立身为巫山女神……这些“化生”神话就充分隐含着中国文化的现世形态和乐观意识，生命之流不遏不止、生生不息。骆宾基《蓝色的图们江》中主人公“果木仙”有类于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果木仙”被“王母”收回上界后，其遗留下的

始西进云南采买黄铜，导致了百色的兴起。而百色的兴起，又为王朝政治、军事据点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同时，铜钱供应量的增加，为清政府在当地推行赋役制度提供了货币基础。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促成了改土归流的成功实践。

改土归流对右江地区的社会转型、王朝国家的政治生态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必须超越“事件史”的分析框架，用长时段、整体的眼光展开思考：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当地社会的脉络之中，理解王朝国家政治在当地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将这一事件放在区域乃至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只有这样，才能在某一领域取得更多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粤商与明清时期西江流域土著社会的构建研究”负责人、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 刘长华

民族神

國家社科基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光明日报社理论部 主办